

韩愈散文艺术论

孙昌武文集

3

中华书局

韩愈散文艺术论

孙昌武文集

3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愈散文艺术论/孙昌武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9.8  
(孙昌武文集)  
ISBN 978-7-101-13099-7

I.韩… II.孙… III.韩愈(768~824)—古典散文—古典文学  
研究—文集 IV.I207.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8634号

- 
- 书 名 韩愈散文艺术论  
著 者 孙昌武  
丛 书 名 孙昌武文集  
责任编辑 齐浣心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8月北京第1版  
201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21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099-7  
定 价 58.00元
-

## 孙昌武文集

# 出版说明

孙昌武先生，一九三七年生，辽宁省营口市人。南开大学教授，曾在亚欧和中国港台地区多所大学担任教职和从事研究工作。

孙先生治学集中在两个领域：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宗教文化。孙先生学术视野广阔，熟谙传统典籍和佛、道二藏，勤于著述，多有建树，形成鲜明的学术特色。所著《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华书局，2010）、《禅宗十五讲》（中华书局，2017）等推进了相关学术领域研究，在国内外广有影响；作为近几十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成果，世所公认，垂范学林。

孙先生已年逾八秩。为总结并集中呈现孙先生学术成就，兹编辑出版《孙昌武文集》。文集收录孙先生已出版专著、论文集；另增加未曾出版的专著《文苑杂谈》、《解说观音》、《僧诗与诗僧》三种；孙先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未曾辑入论文集的，另编为若干集收入。孙先生整理的古籍、翻译的外国学者著作，不包括在本文集内。中华书局编辑部对文字重新进行了审核、校订，庶作为孙先生著作定本呈献给读者。

北京横山书院热心襄助文化公益事业，文集出版得其资助，谨致谢忱。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九年五月

## 序 言

——笔者准备在这本小册子里，对我国唐代文学家、思想家韩愈的散文创作艺术，做以初步的探讨和评介。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生活于中唐时期的代、德、顺、宪、穆宗朝。他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算是一个有重大影响、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作为文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诗、文兼擅；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独特成绩，而尤以散文创作成就更大。他处于中唐那种矛盾丛生、世道渐衰的大变动时代，思想上、政治上都显得矛盾、复杂。因此，后人对他的评论，也是异说歧出。但不管这些评价如何不同，对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一般是给予肯定的。他在生前就受到“学浪词锋压九州”(王建《寄上韩愈侍郎》，《全唐诗》卷三〇〇)的赞誉。苏轼更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文公庙碑》，《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五)。这虽然都不无溢美的成分，但也确实表明了他引领一代文坛、改变一代文风的巨大贡献，以及他在时人、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散文上，他不仅有卓越的创作成果，而且有较系统的理论建树。他更诱掖后学，倡导“古文”。在他与柳宗元等人的努力之下，把唐代已有长期发展历史的文体改革和散文革新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造成了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高峰。他们倡导的“古文”，一时间形成了席卷文坛的声势，出现了名家辈出、名作如林的局面。而他本人的散文创作，更影响当代，沾丐后人，成了宝贵的艺术财富流传至今。

从而他也就成为一代文坛宗师、中国散文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韩愈创作散文,倡导“古文运动”之得以取得成功,主、客观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他的很大的长处,就是他十分重视散文写作艺术,努力于散文艺术的完善与提高。他的文章千余年来代代相传,影响深远,原因也很多,而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们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和巨大的美学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的散文是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的统一的。韩愈追求“文以明道”。对于他所“明”之“道”的内容与价值,历来就有争议,今天批评更多。但他的文章的艺术技巧,一般总是得到承认并被给予很高评价的。鲁迅先生论及文学创作中艺术方面的重要,曾精辟地指出:“其实,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致蔡斐君》,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二〇二页,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这就意味着,文学作品之作为艺术创作,首要的它得是文学,它得具有文学特有的艺术特征。这与评价文学作品的政治效果首先要看它的思想内容好坏是两码事。韩愈是主张张扬儒道的,他对于卫道有极高的热忱;但他写的多是文学散文,又很讲究写作艺术。结果尽管他思想上有很多局限,但他在散文创作上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样,研究韩愈,就必须重视研究他的散文艺术。然而从韩愈生前到如今,对他的散文推重的人很多,学习的人也很多,从理论上对它们的写作艺术加以细致分析、评价的却不多。明、清以来不少人评点韩文,评点人不乏见解精审者,评点内容也不乏真知灼见,但他们用的不是科学的方法,所见也多在枝枝节节。这样,研究韩愈散文创作的艺术方面,就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这方面,近年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出现一些有价值的成果。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前人与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韩愈散文艺术加以探讨。见解肯定是浅薄粗疏的,但愿与喜读韩文者共同赏析、商量,愿向前辈与同道请益。这是笔

者动笔的第一个用意。

再者，韩愈作为中国散文史上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所表现出的艺术特征及其内在矛盾具有很大的典型性。认识和理解这些特征与矛盾，对于加深理解中国古典散文的特点与规律，会有一定的助益。中国散文形成、发展的历史，在整个世界文学中显然有其独特处。因此它在艺术形式与创作方法上，与另一些国家的散文，如西欧各国的就很不相同。譬如，早期中国散文是与学术、政令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了以后发展中高度政治性与实用性的传统。这就造成了一个按现代文学观念如何区划中国散文界限的问题。具体到韩愈研究上，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古文”哪些算作文学散文？《原道》那样的哲学著作是不是散文？大量的碑、传、书、序等实用文章算不算散文？这也涉及到六朝以来对“文”的看法的长期纷争。直到清末，阮元提倡新“文笔论”，还在否定“古文”之可以称为“文”。他说过：“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古文’乎！”（《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擘经室三集》卷二）这就完全否定了“古文”作为文学散文的价值。而清初桐城派古文家方苞则认为“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肆也”（《古文约选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后来的姚鼐更提出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文章观。这就又把“古文”视为中国“文”的正统。近年来，人们用形象思维的标准来衡量古典散文，对韩文的文学价值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研究一个课题，明确它的对象是个根本出发点。散文界限不搞清楚，也就谈不到研究散文艺术，而这就关系到中国散文特点的根本问题。结合韩愈这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创作实际，我们来分析他的散文的艺术特征，对于认识整个中国散文的特殊规律，会是有益的。涉及到中国古典散文的文体问

题、语言问题、表现方法问题，也是如此。所以，分析韩愈散文艺术的成就，将有助于探讨中国古典散文的规律。笔者想在这方面做点工作。这是写作本书的第二个用意。

第三，中国散文的悠久而优秀的历史传统，是近、现代散文发达的前提条件之一。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哺育下，才出现了鲁迅那样伟大的散文家。现代和当代文坛上的代表人物，如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人，几乎无一不是卓越的散文大师。“五四”以来，散文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对革命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直到现在，散文仍是广大群众喜爱的文学形式之一，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与教育作用。今天，提高散文的艺术水平，有一个批判地继承历史传统的问题。通过对韩愈这样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的散文大师的研究，会为当代散文创作实践提供很好的借鉴。从中国新文学史发展看，现代散文创作受到西欧与日本散文的影响。连“散文”一语也是从外语翻译过来的，和中国传统上与骈文对待的“散文”意思上完全不同。这种西方的影响对于中国散文的发展自然是积极的、有益的。但中国现、当代散文，从根本上说，是古代散文的历史的发展。它也应当在历史传统中更多更好地汲取营养。我们读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等哀祭文字，从中自然会体认出韩、欧等人哀祭文字的影响。所以，研究韩愈散文艺术，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中国散文的历史经验，发展今天的散文创作。这是写作本书时的又一个想法。

以上三个方面，涉及的问题太广了，题目是太重大了。完成这些任务，对于笔者来说，只能是一个奢望，一次初步的尝试，或者，只是提出一些问题，抛砖引玉，求得指教。

笔者对古典散文有点“偏爱”。宋代以前，诗与文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两大主流。宋代以后，小说、戏曲等渐趋繁荣，古典诗文逐渐僵化与衰落。但是，后者也并不是没有成绩。在衰落的潮流中是有曲折、有反复，也时有高潮激起的。但从近年来的古典文学研

究看,对散文所做的工作,比例太不相称了。就是韩愈这样的大家,从作品的出版与普及到专门的研究,成果还是很有限的。与地位相似的诗人、小说家以至戏剧家的情形简直不可比拟。笔者虽然学疏才浅,但有志于在这方面略尽绵薄。谨以这本拙作奉献给读者,期望有更多的人对古典散文艺术加以关注,并写出更好的论著来。这也算做笔者写作本书的最后一个用意罢。

#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章 “文以明道”,卫道重“文” .....	1
第二章 传道明理,兴功用世 .....	20
第三章 革新文体 .....	38
第四章 改革文风 .....	60
第五章 写作技巧(一) .....	74
精辟而形象的议论 .....	75
洗炼而生动的记叙 .....	93
真切而细致的描写 .....	108
质朴而热烈的抒情 .....	120
第六章 写作技巧(二) .....	132
立意 .....	133
结构 .....	146
讽刺 .....	163
比喻 .....	173

---

第七章 文学语言 .....	183
形象性 .....	184
主观性 .....	195
形式美 .....	202
提炼词语 .....	220
余论:影响与功过 .....	231
1986 年版后记 .....	239

## 第一章 “文以明道”，卫道重“文”

笔者在拙著《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中曾提到，唐代“古文运动”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领导者在理论上具有高度的自觉性。韩、柳等人针对当时文坛的实际，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探讨了自先秦以来中国散文长期发展的历史规律，提出了相当明确、相当系统的革新文体、改进文风、进行散文创作的主张。这些主张，作为一种理论纲领，在指导文坛、诱掖后学上起着巨大的号召、动员、教育作用，也是他们自身从事创作活动和理论宣传的思想支柱。所以“古文”之造成统治文坛的声势并被后人视为“运动”，以及“古文”创作水平的提高与扩大影响，都直接得益于韩、柳诸人在“古文”理论方面的创获。这也是韩、柳等唐代“古文”家们文学活动的一个重大优点。

在这个方面，韩愈在整个唐代“古文运动”的历史发展中做出了他人不可比拟的杰出贡献。正是他，第一个明确提出并阐发了“文以明道”的理论，从新的角度与高度，比较正确地解决了“文”与“道”的关系问题，重新确定了作为文学散文的“文”的性质、作用与地位；同时，他又大力探讨“文”的艺术特征，把“古文”当作艺术创作来加以重视。他以“文”来明道，因此又为卫道而重“文”。仅就这两点说，韩愈就抓住了当时文坛面临的主要矛盾，并提出了创新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又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反映了时代思想发展的潮流。在同时代人中，例如与他并列为“古文运动”“双

壁”的柳宗元，不仅在理论的明确性与系统性上不如他，而且整个理论思想的发展可以说是在他的影响之下的。柳宗元同样提出“文以明道”，但从时间看就远在韩愈以后。

因此，探讨韩愈的散文艺术，我们应首先讨论韩愈对作为文学散文的“文”的看法。



韩愈评价柳宗元一生业绩，说过这样一段话：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柳子厚墓志铭》）<sup>①</sup>

这里结论故作疑词，韩愈显然认为“文学辞章”的历史价值是高于“为将相于一时”的实际功业的价值。大家知道，韩、柳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所以表现在文章中，也有不少意见相左。但在这段议论里，韩愈尽管对柳宗元的一生活活动隐含微词，却高度赞扬了他的文章。实际上，理解这段话的意思，不应只看作是对柳宗元本人功过的评价，而且包含着强调“文”的地位与意义、强调“文人”的价值

<sup>①</sup>本书引用韩文，除特别注出者外，均据《韩昌黎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排印本。以下不再注出书名、卷次。

与作用的新看法。

再看看韩愈的另一篇文章《送孟东野序》。其中提出的“不平则鸣”的看法，是欧阳修“文穷而后工”主张的先声。但是在文章逻辑思路上有问题：讲“不平则鸣”，从物说到人；讲人，又从唐虞说到当代；作为例子的，则从咎陶、禹到周、孔、诸子百家，直到孟郊、李翱、张籍，因而宋人洪迈指出：“韩文公《送孟东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则鸣。’然其文云：‘在唐虞时，咎陶、禹其善鸣者，而假之以鸣。夔假于韶以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又云：‘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然则非所谓不得其平也。”（《容斋随笔》卷四）近人杨树达先生在《汉文文言修辞学》中亦列此为文病。确实，韩愈这篇文章在立意上以“不平则鸣”为主干，但使用“不平”一词却含义歧出。“不平”之“平”如果是平正、平静的意思，那么喜、怒、哀、乐都是“不平”，“不平则鸣”就是“感物而动”、“缘事而发”的意思；但韩愈在文章末后归结到孟郊，却又说到“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则又用了愤郁“不平”的内涵。但今天我们分析他的这个观念会看到，正是在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中，韩愈把一个穷诗人与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等同起来了。林云铭解释说：“篇中从物声说到人言，从人言说到文辞，从历代说到唐朝，总以天假善鸣一语作骨，把个千古能文的才人，看得异样郑重。然后落入东野身上，盛称其诗，与历代相较一番，知其为天所假，自当听天所命。”（《韩文起》卷五）韩愈文章是否以“听天所命”为主旨，容后另议；文章中反映了韩愈的唯心主义天命观，也是不可否认的。但在今天看来，韩愈把一个“文人”看得那么重要，他的言辞意义那么重大，却是一种新观念，反映了他对于“文”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他所举出的唐代的“能鸣”者，除上列三人外，还有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九个人，全是文学家。

意思是“能文之人”的“文人”一语，出现在汉代以后。《诗·大雅·江汉》：“厘尔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毛《传》：“文人，文德

之人也。”孔《疏》：“汝当受之，以告祭于汝先祖有文德之人。”（《毛诗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文侯之命》：“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孔《传》：“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当用是道合会继汝君以善，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尚书正义》卷二十，《十三经注疏》本）《诗经》的《大雅·江汉》作于西周，《尚书》的《文侯之命》属今文，可信为早出。在当时，“文人”只是“文德之人”的意思。这也反映了那时候“文”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实际。到了汉代，才出现了“能文之人”的“文士”、“文人”。如《韩诗外传》卷七：“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王充《论衡·超奇》：“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但在当时，“文人”所能还被视为技艺。以司马迁之宏才，不过被“俳优畜之”；扬雄则自悔少年作赋是“雕虫篆刻”。王充把“文人”提高到儒生、通人之上，颇有高自标帜之意，但仍不出“士”的一列。到了汉、魏之际，鲁迅所提出过的“自觉的文学观念”形成了，文人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出现了也是鲁迅提过的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八）那样的主张。但同时代的曹植却又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与杨德祖书》，同上卷十六）这显然表现出轻视文人和文才的意思。对这一点，鲁迅在《而已集》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分析，曹植是作“违心之论”，说他一是文章作得好，不满于自己所作而羡慕他人之所为；二是其活动“目标在于政治方面”。这就表明了，在那个时代，不论“文”与“文人”是如何受重视，但文事在人们的观念中，地位与意义远在实际的政治事功以下。通观六朝及其以前，“文人”也确乎只能“帮忙”与“帮闲”，

作为贵族阶层的附庸而已。

这样，再来对比前述韩愈文章的看法，则韩愈显然把文章与事功、道德、思想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本来是主张以儒道济世的，但他在《师说》中却把“传道”与“授业”并列。正如朱熹所解释的，这里的“业”就是“六艺”之业，包括写文章的技能。他的《进学解》是以解嘲的形式自我肯定、自我揄扬的文章，其中也是儒学、文章、道德并称，重点称扬自己的文章技能。他说自己“性本好文学”（《上兵部李侍郎书》）；“愈少驽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努力，又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齟齬。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答窦秀才书》）。这里的“文学”即指“古文”之学。他中进士后，制举不利，三上宰相书，大讲自己如何会作文章，“其业则读书著文”，“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又夸耀自己的文章如何与流行的“绣绘雕琢之文”不同。他的《与孟尚书书》，表白自己的心迹，以孟子为楷模。孟子在杨、墨交乱之后，“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这样，要“使其道由愈而粗传”，实际靠的还是文章。所以，他一再表示，文章可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答崔立之书》），君子“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答李翱书》）。总之，在他看来，文章的作用绝不在道德、事功之下；从事文章写作的意义起码不次于从政作官。

韩愈对“文人”的这种看法，反映了客观现实的变化。一方面，到了唐代，阶级关系发生了有利于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不少没有等级特权的文人可以凭借政能文才取得政治地位，文才受到普遍的重视；另一方面，文学作为独立的意识形态又有新的巨大发展，它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干预政治的作用更为突出。如白居易等人写“新乐府”，就把诗当作比朝廷章奏更为犀利有效的政治工具。这样，韩愈的新的“文人”观念，反映了现实的变化，也反映

了当时“文人”阶层的要求。

韩愈如此大力肯定“文人”的作用与地位，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散文家的事业心与责任感。在他看来，文章不再是“小道”，不再是“雕虫小技”；文学事业的价值也不次于政治事功。他用这个观点动员文坛，教育后学，使更多的人自觉地穷精力于文章。这对于“古文”的大普及、大发展是有重大作用的。宋代以后，有人从儒学的角度批评韩愈为“文人”，如张耒说：“韩退之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韩愈论》，《张右史文集》卷五十六）王守仁说：“退之，文人之雄耳。”（《传习录》卷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这些话本意都在贬低韩愈在儒学上的地位。韩愈在儒学上的得失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这也确实透露了历史真相：韩愈重视“文人”，并努力作一个“文人”，完成他所理想的“文人”的事业。

## 二

与这种新的“文人”观念相联系的，是一种新的文章观念，即“文以明道”、卫道重“文”的“古文”观。

“古文”观念不自韩愈始<sup>①</sup>，在当时亦非仅他一人提倡；但在理论上大力宣扬，并系统提出“文以明道”新观点的却是他。这种观点的提出，使“古文”理论得到了质的提高，在指导创作实践上也是一种新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李翱《与陆惨书》说：“又思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词与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

<sup>①</sup> 参见拙著《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序章《“古文”的含义与渊源》，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